

我国各少数民族 在明代抗倭斗争中的贡献

向 东 方

四百多年前，我国沿海地区的抗倭斗争，是一次以汉族为主体，并有僮、土家、苗、瑶、畲、高山等民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清除了倭寇的祸患，捍卫了祖国东部边疆的安全。在这次斗争中，充分表现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

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活动由来已久，早在明朝初年就开始了。明洪武年间，日本正处在南北朝的分裂时期，各诸侯之间进行着剧烈的兼并战争。经过长期的混战，结果北朝击败了南朝，暂时统一了全国；而南朝失败的封建诸侯则支持并组织了一部分丧失军职的武士、失意的政客和海上走私的商人，经常出没于中国沿海地区，与中国境内的汉奸窝主、海寇、奸商和流氓分子相勾结，狼狽为奸，抢劫商船，掠夺财物，屠杀居民，进行海盗活动。因之，在历史上就称之为“倭寇”。但是，由于当时明朝力量尚称强盛，社会比较安定，海防也比较巩固，倭寇的为害未能酿成大患。

明英宗正統以后，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的骚扰活动又开始猖獗起来，至嘉靖年间达到了极点。这时，倭寇的复形猖獗，是与日本的社会状况密切联系的。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间进行着长期剧烈的兼并战争，造成了日本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引起了日本人民的日益不满。这时，有的诸侯为了解决国内战争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大规模地进行海盗活动，在中国沿海地区大肆掠夺；甚至还利用向明朝进行正常贸易的机会，从事非法的武装走私活动。倭寇的这些罪恶活动，又与西方殖民者的利益密切联系。一五四三年（明嘉靖二十二年），葡萄牙商船到了日本，以后以平户、长崎为互市市场。葡萄牙殖民者从日本运走大批的奴隶和黄金；这些奴隶中，除了日本国内战败了的领主的家臣和农民外，就是从中国大陆沿海掳掠去的中国人民^①。可是，面对着倭寇对我国沿海地区的严重侵害，腐朽的明朝统治者却束手无策，无力对付。

明朝自中叶以后，国力渐衰，特别是到了世宗嘉靖年间，危机就更加严重了。这时，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农民的赋税负担十分沉重，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极其尖锐，政治的腐败黑暗达到极点。明朝统治者忙于镇压国内各地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而沿海防务空前废弛。原来海防前线设置的卫所遭到严重破坏，士兵逃亡，兵员不足，战船破旧不堪。每遇倭寇来犯，军士望贼奔溃，闻风丧胆，不战自退；或是临时招募渔船，糾合民丁，仓促应战。由于

① 参阅李光壁：《明代御倭战争》第八页，转引自洪平健：“日本历史的发展”，刊中山大学研究院《史学专刊》一卷四期。

政治的腐败，卫所的破坏，海防的廢弛，大大削弱了抵御倭寇的能力，以致造成倭患的长期蔓延与扩大。沿海各省，北起河北、山东，南至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广大地区，都遭到倭寇的严重骚扰和破坏，給我国沿海各族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倭寇骚扰东南沿海地区，奸淫燒杀，无所不为，所到之处，無論城镇或农村，官府或民舍，都被焚劫一空；妇女被侮辱，老人、儿童被杀害，少壮被擄掠；家畜、財物被搶光。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者，不可胜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公元一四三九年（正統四年）四月，倭寇犯浙东的大暑、桃渚时，“官庾民舍，焚劫一空，驅掠少壮，发掘冢墓。束嬰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号，拍手笑乐。捕得孕妇，卜度男女，剝視中否为胜负，飲酒。荒淫秽恶，至有不可言者。积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萧条，过者隕涕。”^①仅江浙一带，自一五五二年（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三、四年間，吏民遭到倭寇惨杀的不下数十万人之多^②。一五五三年前后，倭寇先后窜扰台州、吳淞、海州、海盐一带，“掠我居民，……杀掠惨甚。”^③“纵火焚城楼及民屋数百間”^④。“据城数日，焚毀庐廨，略尽。”^⑤一五五四年三月，倭寇余党流入硤石鎮，經长安、临平諸鎮至余杭，“杀掠甚惨，数百里內人皆窜亡，困苦极矣”^⑥；四月，守港門的倭寇“随处掠劫人口，男則导行，战則令先驅，妇人昼則縲茧，夜則聚而淫之”^⑦；此时，倭寇“益鴟張猖噬，昼則分党四出，夜則复归巢穴，据險乘高，立棚自固，擄金帛，汚子女，薄室庐，万姓忿恨，无所控訴”^⑧；五月，倭寇盘踞石墩等地，“凡四旬有三日，杀害数千人，蕩民产数万家”^⑨；十二月，倭寇“纵火焚呂巷鎮民居，五昼夜不熄，存者百无一二”^⑩。一五五五年，倭寇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轉掠橫西、新市、橫壩、双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州城外数十里內流血成川^⑪。通州（今江苏南通县）及溫台、淮楊、常鎮諸府，亦遭蹂躪^⑫。一五五六年四月，硤石倭寇“据惠力寺山頂，悬大白旗为号，出掠則揚旗，归巢則偃之，所掠蚕茧，令妇女在寺縲絲，裸形戏辱之状，惨不可言”^⑬。归有光目睹崑山县遭受倭禍的惨状，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大小三十余战。……被杀男女五百余人，被燒房屋二万余間，被发棺冢四十余具。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⑭一五五八年（嘉靖三十七年）以后，倭寇除繼續蹂躪江、浙地区外，旋轉入福建，自福宁至漳泉千余里，尽成贼巢，遂蔓延至广东潮州一带。倭寇骚扰福建的七、八年間，“破城十余，掠子女財物数百万，官軍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十余万。”^⑮这就是倭寇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它給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是罄竹难书的。

由于倭寇的长期为害，不仅使我国东南沿海广大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而且也給正在发展中的社会經济带来了严重的摧殘和破坏。在明代，东南沿海一带是我国商品經济最发达的地方，这里农业生产水平很高，手工业尤为发达，商业最称繁荣。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手工业各行业，如紡織、采矿、冶鑄、制盐、陶瓷等，在这个

① 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二，“国朝典汇”，見《中国內乱外禍历史丛书》第八册，神州国光社一九四七年版。

② 參見謝承仁、宁可：《戚继光》第二十一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③④⑥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⑦⑧⑩ 明·采九德：《倭变事略》卷二，見《丛书集成》。

⑨ 明·郑茂：《靖海紀略》，見《中国內乱外禍历史丛书》第八册。

⑪ 清·玉崑山人：《金山倭变小志》，見《中国內乱外禍历史丛书》第八册。

⑫ 參見謝承仁、宁可：《戚继光》第二十頁。

⑬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郑茂：《靖海紀略》，附“全城志”。

⑭ 《倭变事略》卷四。

⑮ 归有光：《崑山县倭寇始末》，見光緒《崑新两县續修合志》卷五十一，“紀兵”。

⑯ 谷应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时期都有了迅速的扩大和发展。在这些行业中，以纺织业最为发达。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等地都是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大城镇。苏州是当时丝织业中心，家家户户都以纺织为业，织机之声昼夜不停。嘉兴的王江涇镇，“多织绸收丝缁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①松江是棉纺织业中心，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有些农民已把纺织业作为自己的专业，城市、乡村都从事纺织。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发展迅速，在手工业发达的市镇周围，农民大多种植棉花，植桑养蚕，专门供应城镇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商品交换十分发达，苏、松、杭、嘉、湖既是手工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和繁华的市镇。以福建龙溪、广东佛山为中心的冶铸业，生产规模很大，享有盛名。在这些商品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在一些行业中，特别是纺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倭寇为了劫取中国钱财、丝织品和其他物产，对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江、浙一带，大肆劫掠。倭寇所到之处，蚕丝几乎被掠一空，人民逃亡，田园荒蕪。一五五四年（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倭寇掠苏松“民舟入海，趋江北，大掠海门、如皋、通州，焚各盐场……。”^②这样势必使这些地区正在发展的农业、手工业和正在滋长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受到严重摧残。

二

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侵略，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慨，反对外来侵略，捍卫祖国安全的呼声传遍各地，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侮。所以，倭寇侵略的过程，也就是我国各族人民反对侵略的过程。我国各少数民族在这次抗倭斗争中，与汉族人民一起，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为保全祖国领土的完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明世宗嘉靖年间，倭寇的骚扰最为猖獗，受害地区尤以江、浙为甚。由于明廷政治腐败，卫所残破，军队丧失战斗力，致倭患愈演愈烈。一五五四年（嘉靖三十三年）起，张经督理东南各省军务，他一面积极就地练兵，一面奏请征调广西南丹、东兰、那地、归顺、田州等地的“狼兵”（主要由僮族人民组成，以下改称倭兵），以及湖广永顺、保靖二宣慰司的“土兵”（按即土家族、苗族组成的军队）等援浙，协力抵御倭寇^③。由僮、土家、苗等少数民族人民组成的倭、土兵，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军队。在“岛寇之变，东南之民，焚劫殆尽”的情况下，张经认为：“寇强民弱，非借倭兵不可。”^④后来任总督的胡宗宪也认为：“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广兵钩镰枪弩之技，必须动永、保二宣慰司精兵。”^⑤

在张经的一再奏请下，明廷始允征调。土家、苗、瑤、僮等少数民族，为了保卫祖国安全、击败倭寇侵略，踊跃应征。广西以田州土官妇瓦氏所率及东兰、那地、南丹、归顺等州倭兵六千余名应征；湖广以永顺宣慰司官舍彭翼南、保靖宣慰使彭薰臣为首，各统土兵三千名，以及致仕宣慰彭明辅、官生彭守中等报效兵二千名应调，奔赴苏、松前线^⑥。

土家、苗、僮等少数民族在奉调应征时，表现出他们与全国人民共患难，同仇敌愾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这从当时被征调的倭兵、土兵的实际人数往往超过应调人数可以看出：“湖广土兵……近尝调三千人，后调六千，此在官之数也，实私加一倍，共一万二千人。”^⑦“明代征剿，动调土兵，而土司兵中又以广西之倭兵，湖广永顺、保靖之苗兵为最，……土兵踊跃赴调，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数，如调兵三千辄以六千至，调兵五千辄以万人至。”^⑧应调

① 《秀水县志》卷一，“市镇”。

②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③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二四；《明史》卷二〇五，“张经传”；《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④ 明·郑若曾：《江南经略》卷八下，“调倭兵记”。

⑤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客兵附录”。

⑥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二一、四二二。

⑦ 《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客兵附录”。

⑧ 魏源：《圣武记》卷十四，页二十七，见《四部备要》。

的倭兵、土兵，不仅数量超过应征调的规定，而且都经过比较严格的挑选，兵精将勇。如能率领一千人的，让他当一百人的将领；能率领一百人的，让他带十人的队伍。即所谓“将千人者，得以军令，临百人之将；将百人者，得以军令，临十人之将”^①。湖广土兵在应调时还举行盟誓的仪式，以表示敢死的决心^②。广西田州土官瓦氏夫人应征时，“年逾六十，子死孙幼，冀立功自振。初以一万三千人应调，兵备不许，止准四千有奇，尝对张司马委官云：‘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盖由衷之言也。”^③这正道出了我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一起，同仇敌愾，与倭寇誓不两立和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

倭兵、土兵的调赴江、浙前线，对抗倭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五五五年（嘉靖三十四年）四月，瓦氏统率倭兵六千余名抵达苏州；湖广土兵亦同时奔赴松江前线。广西倭兵和湖广土兵的到达，大大鼓舞了明军士气，安定了民心。本来，处在东南沿海前线的卫所军队，不但数量少，不敷调度；而且由于政治的极端黑暗，将领的腐化无能，士气低落，军队丧失了战斗力，广大官兵缺乏战胜倭寇的信心。沿海地区人民因倭寇长期骚扰，不能肃清，更惶惶不可终日。“新倭复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闻倭兵至，人心稍安。”^④以张经为首的爱国将领，得到倭兵、土兵的协助，更是欢欣鼓舞，信心倍增，积极布置进击倭寇。

倭兵、土兵在江、浙前线，与以汉族为主力的明军一起，并肩作战，在东南沿海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配合下，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果，在扭转抗倭斗争的局势中发挥了作用。

现在可以看一下，在几次较大的胜利中，倭兵、土兵等少数民族军队所起的作用。一五五五年（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兵、土兵在胜墩（今苏州境内）协同明军作战，“倭兵首殪其渠魁一人，贼气沮”，斩获三百余级，大败倭寇，取得了胜墩之捷^⑤。同年，盘踞三丈浦的倭寇，分股窜扰常熟、江阴一带，兵备副使任环督率保靖土兵千余及官民兵丁三千，攻破贼巢，取得重大战果^⑥，“而我兵不损一人，自用兵以来，陆战全捷，未有若此者也。”^⑦“川沙倭寇驾舟出海，适保靖宣慰使彭薰臣、永顺宣慰使彭翼南以兵至，遂焚其巢。”^⑧倭寇自嘉兴逃奔平望（属吴江县），彭薰臣率土兵二千，跟踪追击，奋勇当先，立斩贼首百余级。^⑨

倭兵、土兵等驰援江、浙以后，连战报捷，揭开了抗倭斗争胜利的序幕。这些少数民族的将士机智善战，遇敌即上，从不退缩。如一五五四年（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倭寇进犯嘉兴，到处烧杀抢掠。时适值倭兵至，郡侯賚餉犒兵，倭兵立即出击。一兵年甫弱冠，独奋身冲锋，连杀七贼，众兵乘胜追击，斩获数十，贼皆溃逃^⑩。六月，倭寇犯苏州、松江一带，大肆焚掠，当时调来的倭兵不满百人，但英勇善战，“每与贼遇，贼辄披靡；偶以二十人当贼二百人，为贼所围，力战得出，杀贼五十余人，倭兵死六人，其间二人尤驍勇，贼至刘家行，单骑追之。”^⑪由于倭兵、土兵等调到江、浙前线，连战皆捷，打击了倭寇嚣张的气焰，使其不敢轻动。如一五五五年三月，倭寇围攻上海县城，时张经调集广兵、湖兵（其中包括倭兵、土兵），甫到松江，倭寇得知，闻风丧胆，不战自退，缩归旧巢^⑫。这些初步的胜利，为取得更大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扭转抗倭斗争战局的是王江泾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倭兵、土兵等少数民族的子弟兵作

①② 《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一，“客兵附录”。

③ 《江南经略》卷八下，“调倭兵记”。

④⑥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二一。

⑤ 《筹海图编》卷六，“直隶倭变记”。

⑦ 《江南经略》卷三上，第三十七页。

⑧ 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二，“杂志”，第十页。

⑨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五，“御寇”。

⑩ 《倭变事略》卷二。

⑪ 《江南经略》卷三上，第一一四页。

⑫ 《江南经略》卷四下，第七十八页。

出了积极贡献,立了功勋。一五五五年五月,四千多倭寇从他们的活动中心柘林(在上海东南)出发到嘉兴去劫掠。当时的总督張經立刻派遣参将卢鑑带领倭兵、土兵,与俞大猷、湯克寬所率领的各路军队配合作战,水陆两路夹击。保靖土兵出奇制胜,首挫其鋒,敗倭寇于石塘灣。倭寇逃窜平望,副总兵俞大猷率明軍和永順土兵拦路截击,倭寇受創,又奔王江涇(今嘉兴北),保靖土兵又从后路跟踪追击;倭寇腹背受击,四面被圍,首尾难顾,陣势大乱,被擒俘、斬首一千九百八十多人,溺水及走死者甚众;四千多人只剩几百人逃回柘林。这就是扭转当时抗倭战局的王江涇战役。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倭寇的猖獗气焰,大大振奋了人心,使全国軍民看到倭寇是可以消灭的,从而增强了抗倭斗争的胜利信心,为以后全部肃清倭患奠定了基础,所謂“自王江涇捷后,我兵始有生气”^①。这是嘉靖年間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决定性胜利,不愧被誉为“东南战功第一”^②。

在王江涇大捷中,如前所述,英勇善战的土家族、苗家的子弟兵立下了卓著的战功,当时的都御史唐順之也承认:“王江涇数千倭子乘胜西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鋒,則何所不至矣!”^③可見土兵在这次战役的胜利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正当御倭战争捷报頻傳时,腐败的明廷由严嵩专政,严党赵文华反誣劾張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机”,顛倒功罪,害死張經,由赵文华、胡宗宪等掌握御倭軍务。他們貪污受賄,克扣軍餉,虐待士兵,更歧視少数民族军队,使他們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正在走向胜利的御倭战争,遭到暫时的挫折。尽管赵文华、胡宗宪又大批征調湖广土兵、广东瑤兵、广西倭兵、四川苗兵、福建賴兵、崇明沙兵、邵林僧兵、山东枪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氏(僮族)、北边騎兵、北平射手等由各民族組成的精兵强将二十余万^④,集中江浙一带,但是他們并不主动出击,只企图用招撫的办法,消弥倭患。而东南沿海的广大人民和各民族組成的广大爱国官兵,却不顾阻撓、歧視,主动出击,毫不留情地給倭寇以致命的打击,几乎是屡战皆捷,取得了不少抗倭战役的胜利。一五五五年十一月,容美土兵在土目田九霄率领下,与明政府軍协力歼倭于紹兴江桥后梅一带^⑤;十二月容美土兵又和官軍合力歼倭于嵎县清風岭,斬敌一百七十余^⑥。一五五六年正月,福建、浙江一带的倭寇汇集于浙江錢仓。容美土兵与官軍一起,轉战于曹娥江,在黃家山将殘倭全部歼灭,取得了曹娥江之捷^⑦;七月又肃清了乍浦等地的倭寇^⑧。八月,俞大猷率领明軍与保靖、永順、容美等土兵,大破勾結倭寇的海盜徐海于梁庄,斬首一千二百余級,徐海溺水自杀,“于是浙直倭寇悉平”^⑨,御倭战争的形势更加好轉;同时,戚繼光等著名抗倭将领已到东南沿海前綫,并着手在当地练兵,这就大大增强了抗倭力量,抗倭斗争的胜利更有把握了。

上列事实,已經清楚地表明了少数民族的子弟兵在抗倭斗争中不容忽视的作用。其后,在肃清沿海殘余倭寇和解救当地百姓方面,还不断尽了自己的力量。一五五七年(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大伙倭寇犯江北通泰地区,三千多苗族、土家族的土兵和明軍馳去应援,伤賊无数,俘斬首从,解救了被掠的妇女,軍民安堵^⑩。十二月,来自四川、貴州、湖南的麻寮、大刺、鎮溪、桑植等地土兵六千人,与俞大猷率领的抗倭軍,火攻盘踞在宁波府定海、

① 《筹海图編》卷九,“大捷考”,沈明臣撰:“宁台温之捷”。

② 《明史》卷三一〇,“湖广土司傳”。

③ 《筹海图編》卷十一,引都御史唐順之云。

④ 光緒·王念:《戚少保年譜》卷一,附录“征兵考实”。

⑤ 《筹海图編》卷九,“大捷考”,張节撰:“后梅之捷”。

⑥ 同上,吳嶽撰:《清風岭之捷》。

⑦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三一。

⑧ 《筹海图編》卷九,“大捷考”,諸大圭撰“乍浦之捷”。

⑨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三八、四三九。

⑩ 《阜宁县新志》卷八,附录“平倭碑記”。

舟山等地的倭寇，斬首一百四十余級，余被焚死，解救被擄男婦百余人^①。一五五八年（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土官彭志显等率大刺、鎮溪、麻寮土兵与官軍协同作战，在舟山歼灭与倭寇相勾結的海盜王直及其余党^②。一五五九年二月，两广兵、僭兵剿灭流窜福建漳州等地的倭寇，救出被虏百姓一百八十余名，牛馬二百二十余头^③。

当倭寇在江、浙一带遭到沉重打击后，轉向福建、台灣等地窜犯。一五五九年倭寇攻掠閩东的福安、連江、宁德等县，大肆燒、杀、淫、掠，当地汉、畬居民当即奋起組織自卫武装，配合官軍抗击倭寇。当戚继光在浙、閩剿倭时，得到汉、畬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密切配合，打垮了流窜的倭寇。

倭寇窜犯福建失败后，一五六三年又事台灣鸡籠（今基隆）一带，为害人民，当地高山族人民予以坚决抗击，后来在明官軍的增援和汉族、高山族人民的共同抗击下，赶走了倭寇。

由此可見，在明代的抗倭斗争中，僮、土家、苗、畬、高山等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英勇战斗，流血牺牲，取得了輝煌的战績，终于蕩平了为害数十年的倭寇，保障了祖国东南沿海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海疆的安全；特别是在打击倭寇猖獗的气焰、扭轉抗倭战局的形势中，以僮、苗、土家等少数民族子弟为主組成的僭兵、土兵，起了显著的作用。

三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明代长期的抗倭斗争及其胜利中，所以能够作出积极的贡献，其原因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

首先，明代的抗倭战争，就其性质来说，是一次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保卫祖国領土完整、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正义战争，因而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④正是这样，为了共同抵御倭寇，保卫祖国，保卫人民，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充分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奔赴战场，英勇杀敌，树立功勋。这些少数民族的队伍，不仅勇敢善战，战斗力强；而且紀律良好，得到人民的支持。如以广西僮族为主組成的僭兵，瓦氏“以妇人将兵，頗有紀律，秋毫无犯”^⑤。对于違犯軍紀的士兵，必严肃处置。瓦氏“驍勇善战，軍令严明，一卒夺民食，即斬之，食尚在吭間”^⑥。少数民族的抗倭軍，在历次的胜利战斗中，解救了大批惨遭倭寇擄掠蹂躪的当地百姓，使他們能够重見亲人，重建家园；更使当地人民感激不尽。由于少数民族抗倭軍紀律严明，英勇杀敌，解救百姓，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因而更加增强了他們的战斗力、战胜倭寇的信心和有利条件。这是各少数民族軍队在抗倭斗争中所以能作出贡献的主要因素。

其次，我国各少数民族在抗倭斗争中之所以能够树立功勋，还在于各族軍民能够团结一致，彼此配合，互相学习，协同作战。在历次胜利的战斗中，各支队伍都是协同作战，在彼此密切的配合下取得胜利的。当兄弟部队受到攻击时，便毫不迟疑地前去救应，如一五五五年四月，倭寇二、三千人犯金山，“白都司率兵迎击，白被圍数重，瓦氏奋身独援，纵馬冲击，破重圍，白乃得脱。”^⑦这只是其中一例；上面提到过的各地征調来的少数民族軍队与官軍协同作战，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取得胜利的例子是很多的。另外，各族軍民之間还彼此学习，如汉族軍队向土兵、僭兵学习兵法。从招募的民兵中，“擇其最驍勇者，各照僭兵、

① 《明世宗嘉靖实录》卷四四五。

② 《筹海图編》卷九，“大捷考”，俞献可撰：“舟山之捷”。

③ 严从简：《殊城周咨录》卷三，第十一頁。

④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七頁。

⑤ ⑦ 《倭变事略》卷三。

⑥ 《張氏卮言》，見《昭代丛书》辛集，卷二十一。

土兵法，編为队伍，結为营陣，象其衣甲，演其技艺，习其勁捷，隨其动止飲食。”^①以土家族、苗族子弟組成的湖广土兵，在战术上有創造性的貢獻。他們驍勇善战，慣熟陣法，精于“鈎鑣枪弩之技”，使虽善于“短兵相接”的倭寇也胆顛心惊，恐惧异常。^②湖广土兵的陣法巧妙，变化多端，进可攻，退可守，儼如銅墙鉄壁，极难攻破；而其灵活运用，便于出奇制胜，如包圍敌人，即可瓮中捉鳖，全歼之。抗倭名将譚綸、戚继光的著名的鸳鸯陣法，就是学习了湖广土兵的陣法并加以发展提高而成的^③。这种鸳鸯陣法能使各种兵器有效地配合作战，各尽其能，可以迅速适应各种战斗情况^④；而且适应于江南一带多沮澤、道路曲折的地理特点，易于制胜善設伏、擅冲鋒、长于短兵相接的倭寇，在抗倭战争中發揮了极大的威力。由于各族軍民的团結一致、彼此配合、互相学习、协同作战，他們在抗倭斗争中結成了血肉的战斗友誼，而鸳鸯陣法的創造，正是这种战斗友誼的結晶。

最后，倭兵、土兵能“以少击众，十出九胜，天下莫强焉”^⑤，其原因还在于軍队的組織严密，軍令严明，賞罰分明，重視發揮集体的战斗力。倭兵“凡一人赴敌，則左右人呼而夹击，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战沒，而左右不夹击者，临陣即斬，其一伍之众，必論罪以差，……。凡一伍赴敌，則左右伍呼而夹击，而一队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战沒，而左右伍不夹击者，临陣即斬，其一队之众，必論罪以差，……。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众者斬；敌人冲而乱者斬；敌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⑥。土兵也有类似的严格軍紀。严明的軍紀，要求主将亲临指揮，身先士卒，为众将士作出表率，鼓舞士气。倭兵、土兵的战斗力不仅由严格的軍紀来保証，而且以合理的功賞制度来巩固。凡“战沒受上賞；当临陣跃馬前斗，因而摧敌破陣，虽不获級，而能夺敌之气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虏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⑦。在倭兵队伍中还改革了評定軍功以首級为驗的陋习。当时明軍实行以斬获首級多寡为論功行賞的标准，結果往往是“斬賊者必不暇取首級，取首級者必非斬賊之人”，这就会产生賞罰不明的情况，影响士兵作战的积极性。倭兵則以“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刺击，三人专主割首”^⑧，共同論功。湖广土兵“节制甚严，止許击刺，不許割首，違者与退縮者皆斬，故所战必捷，人莫敢撓”^⑨。这样就加强了以伍为单位的集体力量，充分發揮各人的才能，而不必为爭夺首級，領取功賞，而分散力量，影响战斗的效果。当时有人称这是“用兵者之要訣”^⑩。可見，少数民族的軍队，不但驍勇善战，紀律严明，而且善于發揮集体力量，富于創造精神，所以能在抗倭斗争中，起着十分有效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 * *

綜上所述，从明代的抗倭斗争又一次說明了：每当我们偉大祖国一旦遭受外来侵略时，富有光荣革命傳統的我国各族人民，总是联合起来，保卫祖国，給予侵略者以坚决的抗击，充分發揮其爱国主义精神。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互相支持，密切合作，結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誼，促进了彼此間的了解和友好合作的情誼。这种情誼是牢不可破的，它正体现出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的主流。

① 《筹海图編》卷十一，經略一，“募客兵”引御史徐栻云。

② 《筹海图編》卷十一，經略一，“募客兵”引御史章煥云及“客兵附录”。

③⑤ 《圣武記》卷十四，第二十七頁，見《四部备要》。

④ 光緒·王念：《戚少保年譜》卷一；戚继光：《练兵实紀》卷五，見《墨海金壺》。參見謝承仁、宁可：《戚继光》第九四、九五頁。

⑥⑦ 《筹海图編》卷十一，經略一，“客兵附录”。

⑧ 麗露：《赤雅》上，見《知不足斋丛书》；《江南經略》卷八下，“調倭兵記”。

⑨ 《江南經略》卷八下，“調湖兵記”。

⑩ 《江南經略》卷八下，“調倭兵記”。